

# 空间隐喻与风格暗指

——文学地理学“自然气候”视野下的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

曹 忠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7)

**摘 要:** 文学地理学中的“自然气候”范式,强调了自然气候在文学风格形塑中的核心作用。斯达尔夫人之后,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对自然气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鲜有关注。在当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以自然气候为视野考察国内文学地理现象仍具有重要意义。21 世纪以来,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语言风格彰显,正是自然气候深刻影响文学风格的典型。从语言风格对这一作家群体的地域化身份界定,本质上是通过“空间隐喻”方式所达成。“空间隐喻”是指这一作家群体将四川多雾气候的地理特性,以“空间隐喻”的方式“映射”到其作品语言中,形成一种语言风格的地理学暗指。正是这种地理暗指,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才具有一个能被界定的同一身份。

**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 地理气候; 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 空间隐喻; 风格暗指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23)04-0058-10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23.04.008

## Spatial Metaphor and Stylistic Allusion: Sichuan Youth Literature Writers in Natural Climate of Literary Geography

CAO Z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Abstract:** The paradigm of "natural climate" in literary geography emphasizes the central role of natural climate in the shaping of literary style. But after Madame de Stael, the researchers of literary geography focus much l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climate and literature. Currently, it still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the domestic literary geography by studying natural climate. Since the 21<sup>st</sup> century, the special language style of Sichuan writers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literary style has been influenced obviously by natural climate, the regional identity of this group of writers is essentially defined by means of spatial metaphor. Spatial metaphor means that the geographical allusion to a linguistic style was used through putting the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s foggy climate into the language of works. It is this space geographical allusion that allows Sichuan youth literature writers to be defined.

**Key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geographical climate, Sichuan youth literature writer group, spatial metaphors, stylistic allusion.

收稿日期: 2022-12-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忠(1989-) 男,四川泸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符号学。

## 一、以文学地理学“自然气候”视野考察中国文学地理现象的意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的空间体验和地方感对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是不证自明的,就像山东高密之于莫言,陕西商洛之于贾平凹,四川马尔康之于阿来。作家对出生地和生活空间的地方经验,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作家潜意识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风格。而作家地方经验的获得,既受到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受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但不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都可归纳到文学地理学范畴。

文学地理学的起源则主要受到了自然环境影响论的启发,尤其是自然气候影响论的启发。中国学者曾大兴认为西欧文学地理学起源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源头、意大利源头和法国源头<sup>[1]414</sup>。在西欧文学地理学三个源头中,古希腊源头和法国源头都强调了自然地理气候因素。例如古希腊思想家认为人之性格和智慧的特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气候影响<sup>[2]414</sup>。而孟德斯鸠和博丹等法国学者的气候理论,则直接为斯达尔夫人等法国文学地理学者提供了理论借鉴。

作为西方有代表性的气候理论学者,孟德斯鸠和博丹虽然都强调气候对该气候区居民的影响,但二者气候理论分析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比如,就南北气候对精神性格和人情感的不同影响而言,孟德斯鸠认为,寒冷气候和炎热气候对人的性格具有不同影响:寒冷气候区的人精力更足,在炎热气候区的人则缺乏豪迈性格<sup>[2]50</sup>。同时,孟德斯鸠还认为“在寒冷气候地区,人们对于快乐的感受力很弱;在温带地方,这种感受力较强;在热

带地方则极强。”<sup>[2]51</sup>而且,寒冷气候区和热带气候区人的感受敏感度也不同“在热带地方,皮肤组织松弛,神经末梢暴露,连最柔弱物体的最轻微活动都会感知。在寒带地方,皮肤组织紧缩,乳头扁平;神经微束可以说有些麻木;感觉只有在极强的时候才能传入大脑,而且要在全部神经都感知的时候。但是想象、趣味、敏感、机智却要依靠无数种细微的感觉。”<sup>[2]51</sup>

博丹则认为“人的身与心向着相反的方向摇摆,心之智慧力量越大,则身体力量越小。因此,南方炎热地区民族在智力上具有优势,而身体上的力量则弱小;北方寒冷地区民族在身体力量上具有优势,而智慧力量就相对弱小。”<sup>[3]98</sup>博丹还专门就南方地区的夏、冬不同气候对人性格的不同影响进行过分析:“南方人,因为他们从太阳那里得到更多的温暖,所以他们从自己身上得到的温暖更少。冬天热量被收集在身体,但在夏天热量会从身体流出。因此,在冬天南方人更加活跃和健壮,在夏天更加慵懒。”<sup>[3]92</sup>

比较孟德斯鸠和博丹的气候理论可发现,寒冷气候会让人身体更加强壮,进而赋予人豪迈与活跃性格;而炎热气候会让身处其间的居民养成闲适和慵静性格,但身处炎热气候区的居民比身处寒冷气候区的居民更机智。所不同的是,孟德斯鸠还从不同气候对人的快乐感知能力、情感敏锐能力、想象能力的影响等维度进行考察,他认为寒冷气候地区居民对快乐的感受能力明显弱于炎热气候区居民,但寒冷气候区居民的感知敏锐度弱于炎热气候区居民,从而导致炎热气候区居民的想象力、敏感度、趣味等比寒冷气候区居民更为发达。

如前所言,孟德斯鸠和博丹的气候理论,

启发了法国斯达尔夫人等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在《论文学》中,斯达尔夫人在分析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时,就从自然气候因素出发对二者进行区分,这也是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的首次明确提出:

北方人喜欢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诗人的遐想固然可以产生非凡的事物;然而惯常的印象必然出现在人们所写的一切作品之中……他们周围如此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情绪超过在他们心中所引起的感想。我觉得,不应该说南方人的激情比北方人强烈。在南方,人们的兴趣更广,而思想的强烈程度却较逊;然而产生激情和意志的奇迹的,却正是对同一思想的专注。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丰富。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这个大自然,跟它在天气方面所表现的那样,总是阴霾而暗淡。当然,其他种种生活条件也可以使这种趋于忧郁的气质产生种种变化;然而只有这种气质带有民族精神的印记<sup>[4]146-147</sup>。

从上述观点不难看出,斯达尔夫人强调了三点:一是气候是产生南北方审美形象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非唯一原因,这与孟德斯鸠等气候理论者强调的气候单因决定论有所差别;二是强调了南方人的兴趣更广,但思想的强烈程度却更弱于北方,这一观点也与孟德斯鸠认为的南方炎热气候区居民的想象力、敏感度、趣味更为发达的观点不同;三是从自然气候出发,认为自然环境对身处寒冷气候区的北方民族影响更深刻强烈,同时北方民族对痛苦感受更敏锐,但想象力更发达。斯达尔夫人还进一步指出北方自然气候总是

阴霾而黯淡,从而形塑了北方民族忧郁的民族精神印记。这种忧郁的精神与斯达尔夫人当时所推崇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相契合,所以斯达尔夫人对具有忧郁气质的北方文学高度推崇,并在详细论述北方阴郁气候与北方忧郁文学风格关系过程中,开启了文学地理学分析范式。

斯达尔夫人所奠基的文学地理学分析范式,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比如,斯达尔夫人之后的法国学者阿尔贝·蒂博岱就运用区域分异法和区域比较法研究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法国作家的作品风格差异<sup>[1]423</sup>。法国学者丹纳,则将以人文环境和文化地理为核心的“精神气候”作为影响文学风格的核心因素关照。丹纳所谓“精神上的气候”,是与“自然界的气候”相对而言的,也就是“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它们属于影响文学艺术作品产生的人文地理环境<sup>[1]421</sup>。法国学者歌乐·科洛则把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文学空间称为“风景”或“文学风景”。他对“文学风景”的定义是“风景”并不是指作家描写的地方,而是世界的形象,它与作家的风格、感受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不是指对地方的一种索隐,而是整体的风格、形式以及意义<sup>[1]425</sup>。科洛的“文学风景”说在文学地理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指出了“风景”并非对地方的一种地理指涉,而是地理空间呈现出的“整体的风格、形式以及意义”,这无疑使文学地理学具备了某种从真实地理空间“脱域”的可能性,从而使文学的地理性可以通过文学风格、形式和意义等彰显出来。

此外,孟德斯鸠等学者的地理学理论还影响到遥远东方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晚晴以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被译介入中国,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中

国学者受到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为“气候决定论”)等观点影响,对中国文学风格的南北差异予以考察<sup>[1]390</sup>,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对此,曾大兴曾有说明“晚清以前,中国的地理学研究一直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极少有人文地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而梁启超‘堪为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第一人’。”<sup>[1]389</sup>实际上,梁启超不仅将西方“人地关系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理论介绍进中国,还第一次使用了汉语的“文学地理”一词,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现代研究的范式。

梁启超之后的中国学者刘师培借西文方学地理学理论,以中国南北语音为视角,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南北差异:

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音”。则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皆析分南北为二种。然论其大旨,则南音、北音二种,其大纲也。陆法言有言:“吴、楚之音,时伤清浅;燕、赵之音,多伤重浊”。此则言分南北之确证也。(大抵时愈古则音愈浊,时愈后则音愈清,地愈北则音愈重,地愈南则音亦愈轻。)声能成章者谓之言,言之成章者谓之文。……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迥别<sup>[5]559-560</sup>。

刘师培之后,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也从文学地理学思想出发,对中国诗歌受到的南方地理影响进行分析,并着重强调了南方地理空间对身处其间居民想象力的影响: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

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斯即屈子其人也<sup>[6]382-384</sup>。

由此观之,地理气候影响理论不仅为中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启发,而且是建构文学地理学的主要立论范式。但“气候决定论”因为强调了气候这一单一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其本身存在着诸多争议,伏尔泰、霍尔巴赫等西方唯物主义学者曾站在“意志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立场批判孟德斯鸠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sup>[7]</sup>。在中国,1949年后,“气候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被长期列为“资产阶级地理思想”和“天命论”来批判<sup>[8]</sup>。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改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在这一时期获得讨论与研究的话语权,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再次勃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地理学成为“显学”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中,将地理气候因素列为专门议题予以讨论的著作与论文可谓“凤毛麟角”,知网甚至无相关研究论文。但作为启发和建构中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思想理论,“气候”范式理应成为文学地理学分析方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以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对中国文学现象进行地理视野考察,具有拓宽文学现象地理视野的重要意义。

## 二、空间隐喻：基于地理气候的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界定

如果以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分析气候对文学风格的影响,首先需要确保这种关系的明确性与典型性。孟德斯鸠等学者的气候理论招致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强调了气候这一单一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在文学地理学中,不论是斯达尔夫人强调的自然地理气候对文学风格影响,还是丹纳等人强调的“精神气候”对文学风格影响,都指出气候在文学风格的形塑中只起到了某种核心作用,但绝对不是唯一作用,文学风格的形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sup>[1]414,421</sup>。因此,最先明确论及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的斯达尔夫人就选择了“用‘多雾气候下的居民那种激昂的悲伤气质’的说法,描叙北方文学,并对南北文学加以对照”<sup>[9]267</sup>。在斯达尔夫人的论述中,她强调了“多雾气候”与“激昂的悲伤气质”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即多雾气候赋予了这一场域居民激昂的悲伤气质,居民的性格气质又形塑了该区域的文学风格。

之所以选择将多雾气候与悲伤气质文学关系作为其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的论述核心,是因为在斯达尔夫人看来,“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协调的诗歌。和人心的任何其他气质比起来,忧伤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要深刻得多”<sup>[4]146</sup>。换言之,斯达尔夫人在借鉴博丹和孟德斯鸠的气候理论时,选择了那种对人心影响最为深刻的气候,以此达到气候与文学风格之间影响关系的典型关系,从而避开了孟德斯鸠等人“气候决定论”的单因决定缺陷。基于这一逻辑,如果要以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考察中国地理气候对文学风格影响,也需要确保所考察的气候

与文学风格之间关系的典型性。以此为准则,笔者发现四川盆地典型的多雾气候与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写作风格间的关系,正契合了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所强调的气候与文学风格关系的典型性要求。

气候典型性方面,四川盆地是中国四大雾霾气候区之一,不仅“阴天与雾天较多,而且日照时间短和日照强度弱”<sup>[10]</sup>。按照斯达尔夫人等文学地理学者的看法,多雾气候能使生活在这一气候区域的居民养成忧郁性格,并进而形塑忧郁的文学风格;而在文学风格典型性方面,以郭敬明、饶雪漫、七堇年等在青春文学领域进行创作的四川籍作家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其创作方向可能不同,但在语言风格上都呈现出鲜明的感伤主义特征。笔者之所以将郭敬明、饶雪漫、七堇年等在青春文学领域进行创作的四川籍作家称为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主要就是基于他们语言风格上呈现的鲜明感伤主义。

语言风格的彰显是青春文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一些研究青春文学的学者也曾明确提到“语言的成功是80后作家的最大特点。”<sup>[11]3</sup>在青春文学发展过程中,发展出了唯美抒情与幽默讽刺两种语言风格。学者陶东风就曾在评价青春文学写作时指出:“80后作品的语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感染力,具有强烈的唯美色彩;二是极具辛辣的讽刺性,富有强烈的颠覆味道。”<sup>[12]</sup>其中“极具辛辣的讽刺性,富有强烈的颠覆味道”的语言风格,以韩寒为代表,语言风格呈现出犀利、幽默特征,常常通过针砭时弊彰显80后的“反叛性”;“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感染力,具有强烈的唯美色彩”的语言风格,以郭敬明为代表,是青春文学中走感伤与唯美抒情路线的一派。这一

派中的青春文学作家大多由以郭敬明、七堇年、饶雪漫、颜歌等为代表的“川派”作家组成。所强调的是,郭敬明、饶雪漫、七堇年等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川派”作家语言风格上的趋同,本质上乃是四川地理气候对作家创作个性和写作风格的无形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基于语言风格对某一作家群体进行地域化建构的做法,是基于地理气候影响文学风格这一基础的,是地理空间在文学语言风格上的地理学呈现,其相当于前文所提到的歇乐·科洛的“文学风景”。在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界定与命名中,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文学史上以风格为标准,对某一文学作家群的界定并非是对作家群的地域性界定,比如“鸳鸯蝴蝶派”就是指写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的作家群,先锋文学作家群则是指那些将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发起挑战作为创作共同趣旨的作家群体。而以地域界定某一作家群体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且都明确涉及了显在的地理空间:一是以作家的籍贯为划分依据,其涉及了作家群的出生地理空间;二是以作家实际的生活居住地为划分依据,那些由其他地域迁入某一地域并长期生活的作家也被囊括在内。地域作家的这两种界定方式,实际指涉了地域空间对作家写作的不同影响。

就第一种界定方式而言,以籍贯为划分依据的地域作家群,他们的创作风格可能截然不同,他们地域身份获得的标准是行政意义上的居民身份证所赋予的。而第二种地域作家身份的界定,是以作家长期固定的实际生活地域为标准划分。这种划分标准下,地域作家既包括那些本身出生在这一地域,也长期居住于这一地域的作家群体,又包括那些由“他乡”进入这一地域,并长期实际居住

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作家群体。但即便这些以“移民”身份进入的作家群体取得这一地域的行政地理身份,其对该地域的空间体验,往往是以一种“客者”的观察心态显现出来的,并呈现出对客居地域的滥觞式书写。如被誉为“新边塞诗人”代表的沈苇出生在浙江湖州练市镇庄稼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之子”。沈苇在江南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23岁时,沈苇怀着对西部的各种想象,坐了四天三夜火车到了后来被他称为亚洲腹地的新疆。在新疆,沈苇以“外来者”的身份描写新疆、感受新疆,新疆成为他文学书写的核心地理对象。沈苇也因此被贴上了“地域写作”与“新边塞诗人”的标签。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新边塞诗人”杨牧身上,作为比沈苇更早到达新疆的“客居者”,杨牧的诗歌也将新疆作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作品也呈现出浓郁的空间“地理学”风格。

但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作家大多未居住于四川,郭敬明定居上海,七堇年和饶雪漫也未生活居住在四川。同时,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所书写的地域空间,也极少涉及四川。比如郭敬明的主要小说所涉及的地理空间,几乎都未涉及故乡四川,《幻城》《爵迹》等架空小说的地理空间自是如此,而在《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梦里花落知多少》等具有现实地理空间指涉的小说中,郭敬明也将小说的地理空间背景设在上海、北京等地域空间。甚至《1995—2005 夏至未至》这部具有郭敬明高中生活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其也将地理背景设置成一个长满香樟树的虚构的县城——室县。七堇年和饶雪漫等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小说,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也往往呈现为如同郭敬明《1995—2005 夏至未至》这种不具有四川

地理特质的虚构地理空间。

从文学界对某一地域作家命名的惯常方式看,以语言风格界定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命名方式,既未遵循地域作家群的籍贯命名方式(虽然他们都出生于四川),也未遵循地域作家的实际居住地命名原则,因此,这一命名实际违反了地域作家群命名的“原则”。而笔者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能从语言风格对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进行地域化身份界定,是因为这一群体所具有的地理学特征通过“空间隐喻”的方式映射到其作品语言中,因而,作品语言风格成为了歌乐·科洛所说的文学地理学“风景”。

何谓“空间隐喻”?学者吴云解释为:“从空间域向非空间域的映射在语言形式中的表现,我们即可称之为空间隐喻。”<sup>[13]</sup>通过学者吴云的概念解释,我们可以清晰觉察到“空间隐喻”实际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从空间域转向非空间域;二是一种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映射”。当然,地理的映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被格雷戈里所论及。在《地理学构想》中,格雷戈里讨论艺术地理学时,就涉及了“意象”“映像”“映射”等一系列讨论<sup>[14]</sup>。而笔者借用“空间隐喻”概念对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进行地理学界定,主要是基于“空间隐喻”不仅可以表明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地理学界定,是由空间域向非空间域的映射,而且还指出了这映射以语言风格形式呈现。即以郭敬明、七堇年、饶雪漫等四川籍青春文学作家的地域身份界定,就是指一种脱离了原生地理空间的“空间隐喻”。这种空间的隐喻并非指四川这一地域空间被“移植”到异地域空间,甚至也非这一作家群体对四川这一空间的“怀乡式”地理书写,而是以一种非地理空间的语言风

格形态呈现。因此,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地域写作,实际超越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四川,本质上是将四川盆地空间所具有的多雾气候特性,以“空间隐喻”的方式,“映射”到作品语言中,从而形成一种语言风格的地理学暗指。正是这种语言风格的地理学暗指,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才具有一个能被界定的同一地理学身份。

### 三、风格暗指: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语言风格的地理学暗指表现

如上所述,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地域身份的获得,本质上乃是四川地理气候对作家写作经验的地域性建构,即四川地理气候赋予他们的地方写作经验,通过“空间隐喻”方式,转化为注入作品语言风格的地理学暗指。从四川盆地多雾气候出发,这种语言风格的地理学暗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按照气候理论的主流观点来看,四川盆地常年多雾少日照的气候特征,使居住其间的居民具有某种忧郁气质,这种忧郁气质通过“空间隐喻”方式,映射到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语言风格上,从而使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作品语言风格表现出鲜明的忧郁性。有学者统计过,在以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感伤主义一派的写作语言中,忧郁悲伤性质的词语占比很大,以至使作品始终处于一个忧郁的语义场。“‘80后’这一代的青春情绪特点表现大多是孤独、感伤、叛逆,反映到他们的小说作品所选用的词语上,其特点是大量选用以‘泪’‘痛’‘伤’‘寂寞’为核心义素的,表现消极心理的词语。不论是描写人物的心情还是描摹周遭的景物,都喜欢选用此类词语,这些词语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语义场。”<sup>[11]</sup><sup>4</sup>“在郭

敬明的《幻城》中‘流泪’‘泪流满面’出现 10 次以上,《梦里花落知多少》里的眼泪更多,主人公林岚哭过 41 次,林岚她妈哭过 5 次,顾小北哭过 6 次,闻蜻哭过 11 次。”<sup>[11]</sup><sup>5</sup>也因此,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说青春文学“秋意太浓”。实际上,不光是语言,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在作品中也喜欢浓墨重彩地描绘那些阴郁与冷色调的环境和具有忧郁性格的人物。如郭敬明在其成名作《幻城》中,写了冰国与雪国两个世界,但其作品的描写重点则侧重于漫天飞雪的冰国。在这部作品中,郭敬明的叙述都是在一个终年大雪的、忧郁的世界展开。在这个忧郁的国度,郭敬明的文字自然也透着一种冷色的忧郁。

此外,四川的盆地地形形塑了多雾气候下居民的压抑和自我性格。这一特征在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身上往往表现为他们不喜欢张扬个性、叛逆社会,而是倾向于在一种自我的压抑与感伤氛围中诉说自己的不满与困境。同时,他们也更喜欢写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作品的语言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叙事特征。郭敬明在《幻城》及其后续的作品中,都有一种不断对自我灵魂进行审视的倾向。在这种自我写作倾向的驱使下,青春文学作家喜欢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郭敬明的《幻城》就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典型,即便在其后续作品如《1995—2005 夏至未至》中,作者虽然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也使用了大量的第一人称进行独白式的抒情。《幻城》中的大量梦境也是作者通过诸多的人物自我独白展示出来的。这种情况在另一位青春文学“川派”作家七堇年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七堇年的小说里,她不仅喜欢用第一人称叙述,甚至所有主人公都是作者性格的投射。学者霍艳就曾特别提到:

“七堇年的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始终是作者自己,作者是人物命运的牵引者,是人生抉择的阐释者,人物的话语是加工过的作者话语。在每个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见作者本人的性格:敏感、细腻、实则脆弱的坚韧、表面淡定而内里焦灼。”<sup>[15]</sup>但就如学者霍艳所指出的那样,“七堇年作品里的人物,因为被作者强大的自我意识夺去了神采,人物变成了作者的道具,被牵引着穿过世界的罅隙和人性的丛林,完成的不过是作者的单一意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变成了一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封闭的宣言,没有真实世界的复杂情形,作者本人的写作也未免成为一种自我重复。”<sup>[15]</sup>

其次,四川盆地地处亚热带气候区,赋予了多雾气候某种炎热气候区性质。按照孟德斯鸠等学者的气候影响论观点,炎热气候区居民的想象力、敏感度、趣味等比寒冷气候区居民更为发达。因此,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语言写作还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其既表现在语言的唯美抒情上,也体现在语言的想象力中。叙事语言的唯美抒情性,自古便是巴蜀文学的传统。学者邓经武就曾指出“巴蜀文化美学喜艳秾、好华美的审美评判标准,已经早是传统。而‘花间词’是集合了巴蜀地域文化美学的特征,以集群的形式进行的一次聚焦展示。”<sup>[16]</sup>今天,在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的叙事语言中,我们依旧可以窥见“花间词”那种温情的、缠绵式的抒情。在七堇年和颜歌的短篇作品中,也比比皆是“花间词”那种精致、温和的抒情语言风格。

而就语言的想象力而言,语言的想象力也自古就在巴蜀地区盛行,唐朝的李白、陈子昂、薛涛等诗人的诗歌便有着浓厚的想象力色彩,即使是以写实著称的杜甫,在成都草堂



居住期间,也写出了大量充满想象力的诗歌。李白的诗歌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白的诗歌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千百年来从未被超越。这种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传统在四川一直源远流长,近代作家中,四川的巴金、郭沫若、何其芳、陈敬荣、方敬等作家与诗人也是其中的代表。巴蜀自古便有的浪漫主义文风使语言的惊奇想象力成了巴蜀之地作家的自愿与非自愿的蒙学,在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中,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想象色彩。以至曹文轩在给《幻城》的序中就这样写道:“《幻城》来自于幻想。而这种幻想是轻灵的,浪漫的,狂放不羁的,是那种被我称之为‘大幻想’的幻想。”<sup>[17]3</sup>

最后,四川盆地多雾气候,使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作品语言具有某种大气、高贵、郑重的哲学性与宗教自省式腔调。按照迈克尔·费伯所说,这种宗教自省、崇高和宏大的“哲学气质”文学风格,源自忧郁的文学力量“詹姆斯·汤姆森探讨了‘哲学忧郁之力量’的‘神圣影响’,该术语几乎变得与‘哲学’本身同义,与宗教自省同义。文学忧郁所具有的救赎和精神建构的特征,通过一代代浪漫主义者的很多词句保留了下来。”<sup>[18]23</sup>郭敬明在《幻城》的开头就如此写道“很多年以后,我站在竖立着一块炼石海岸,面朝大海,面朝我的王国,面朝臣服于我的子民,面朝凡世起伏的喧嚣,面朝天空的霰雪鸟,泪流满面。”<sup>[17]1</sup>曹文轩也在《幻城》的序中赞赏了这种具有哲学气质的“大腔调”语言“作者年龄虽小,但叙述口气却颇为宏大,也算得上是一种大叙事了。因不是写世俗社会的蝇营狗苟,不是写风尘世界的芸芸众生,而是写梦幻城池,写神圣之战,写王,写大阴谋,写王朝更替,写冰清玉洁之境界,其

笔调自然不能用写小桥流水、油米酱醋、贱民小人、蝇头小利的笔调。小小年纪,居然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大腔圣调,并且还显出一副举重若轻的派头。”<sup>[17]3</sup>

在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另一位作家七堇年那里,这种“大腔调”语言依旧被运用的得心应手。在《你的名字是红》里,她写下如此句子:“我总觉得十月的秋天,就该是属于伊斯坦布尔的。一条街道便是一场帝国旧梦。一片落叶便有一则王朝陈事……翌日,我在黄昏时分离开伊斯坦布尔,赴南部城市 Denizli。坐着大巴士经过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巨大斜拉桥,三分钟时间从欧洲到了亚洲。故都在这个秋日黄昏显得忧郁而苍老。铅云沉沉的阴霾天色下,宽阔冰冷的海面被烈风吹起不断翻滚的波涛,紊乱而破碎地不断幻灭与再生,其状之隐伤,令我无端想起一些脸孔来。眉目淡秀,神情之中有一种一目了然的无情与不信,仿佛就是一些叫人心疼的少年们的样子。”<sup>[19]19</sup>

#### 四、结语

青春文学迅速崛起后,文坛和批评家们对青春文学既有赞扬也有非议,但在对青春文学的关注与评价中,中国文学界,甚至青春文学界,都没有对青春文学中地域化写作报以足够的注意力,青春文学作家的写作,也未被视为一种地方写作现象。个中缘由,或许是青春文学本身的青春化写作特征太过于彰显,以至于其内藏的地理学特征被遮蔽。因此,从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出发,对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进行分析,是对青春文学研究中被遮蔽的地方写作经验的再次彰显。

同时,对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文学地理学考察,也是对四川文学地方风格特征

的有效补充。目前,学界对四川所处的巴蜀地区的文学风格的描述,基本与豪迈、幽默等相关。如学者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对四川所属的“巴蜀文学区”的文学风格进行过介绍,并指出巴蜀文学具有三个突出的地域特点“一是豪放之感,二是闲适之趣,三是近乎怪诞的幽默。”<sup>[1]287</sup>曾大兴先生对巴蜀文学的风格定位,代表了目前学界对巴蜀文学风格的普遍认识。

但如上所述,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写作风格以忧郁、感伤、想象力、哲学式“大

腔调”为核心,显然与学界对四川所属的巴蜀文学风格截然相反。而笔者所界定的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是21世纪以来让四川文学走向全国并产生广泛商业影响的作家群体,但他们的感伤主义语言风格,尚未被视为四川文学的风格特征。因此,从气候出发分析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写作中所呈现的唯美抒情与感伤主义语言风格,既是对文学地理学“气候”范式的展现,更是对四川文学地方风格特征的有效补充。

#### 参考文献:

- [1]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3] ENGEL-JANSI F ,BODIN J ,REYNOLDS B.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66 ,51( 1) .
- [4]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M].徐继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5]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M]//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6]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M]//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7] 杨琪,王兆林.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5(3):77-84.
- [8] 宋正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生发展及其在近现代引起的误解[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9):1-8.
- [9]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M].中文修订版·第2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10] 郭晓梅,陈娟,赵天良,等.1961—2010年四川盆地气候特征及其影响因子[J].气象与环境学报,2014(6):100-107.
- [11] 严芳.“80后”青春小说语言特色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 [12] 陶东风.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5):25-39+157.
- [13] 吴云.认知框架下的空间隐喻研究[J].修辞学习,2003(4):24-28.
- [14] 张慨.艺术地理学的振兴及重构[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3):117-128+148-149.
- [15] 霍艳.召唤模式与旅途游戏:七堇年论[J].南方文坛,2015(5):136-139.
- [16] 邓经武.花间丽词:巴蜀文化美学的一次聚焦狂欢[J].中华文化论坛,2014(7):14-19.
- [17] 郭敬明.幻城[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 [18] 迈克尔·费伯.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M].翟红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 [19] 七堇年.尘曲[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孔明玉)